

北越學習中國大躍進運動的 歷史考察(1958-1960)

• 游 覽

摘要：從1958年起，以總路線為指導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席捲中國的同時，也在國際上特別是各社會主義國家中引發了巨大的震動。其中，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提出的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總方針產生了特別濃厚的興趣並迅速效仿，在1958年下半年至1960年付諸實施。從結果來看，在北越持續一年左右的「躍進」嘗試對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形成推力，但同時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後果。加之中國大躍進負面消息的傳播和中蘇衝突的加劇，這些因素都深刻地影響到越南勞動黨中央領導人的判斷，成為北越最終放棄追循中國大躍進道路的關鍵，並為中越關係在1960年代以後的走向埋下了伏筆。本文對這一特殊的歷史進程進行考察，以期了解中越關係演變的一個重要節點。

關鍵詞：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 中國 大躍進 中越關係 國際共運

二十世紀50年代後期席捲中國全境的大躍進運動影響深遠，從世界範圍內來說，特別是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產生了相當大的震動。當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不同於蘇聯模式的另一種邁向共產主義目標的路線時，立刻引起了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全世界共產黨、工人黨的關注^①。儘管其中包含了相當多的質疑目光和聲音，但依然有部分迫切希望改變自身國家貧窮、落後現狀的共產黨人為之深感振奮，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②）的領導人。越南勞動黨（以下簡稱「勞動黨」）人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學習始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這一趨勢在1949年中國革命奪得勝利之後得到進一步加強，並在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產黨二大上以黨章的形式得到了正式確認。從此後的情況來看，1950至1954年抗法戰爭期間以及1955至1960年的三年恢復（1955-1957）和三年建設計劃（1958-1960）期間，在北越分別出現了

向中國集中學習的兩個階段^③。後一階段的學習重點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經驗，因此中共中央在這一時期提出的大躍進方針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勞動黨和北越政府的共鳴和效仿。本文即是在利用相關中、越、俄文檔案文獻的基礎上，意圖對這一特殊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以期了解中越關係演變的一個重要節點。

一 大躍進對北越產生影響的歷史背景

自1954年7月有關恢復印度支那地區和平的《日內瓦協議》簽署之後，越南南北分治已成定局。在勞動黨領導下的北越政府，此時所面臨的壓力除了來自南方吳庭艷（吳廷琰）政權的抵制和滲透外，還有恢復重建北越的艱鉅任務。經過抗法戰爭的破壞和損耗，北越經濟瀕臨崩潰，交通幾近癱瘓，特別是農業生產停滯導致極為嚴重的糧食緊缺問題，加之南越切斷了向北方的稻米輸送路徑，因而在1954至1955年間，北越境內發生了波及近百萬人的饑荒，造成大量人口失去勞動能力，甚至在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也出現了餓死人的嚴重情況^④。在工業方面，由於勞動黨主席胡志明及其政府拒絕同法國人合作經營，因而在越南人民軍接管北越境內的海防等城市後，法資企業大多已經變賣和搬遷，留下的多為手工作坊及少量輕工業工廠^⑤。這一狀況對於共產黨政權的鞏固極為不利，因為北越從日常生活用品到武器彈藥都無法實現自給自足。由此導致的社會秩序失控，使得北越「匪患」日益加重，暗殺政府官員及工作人員等活動變得十分頻繁^⑥。

面對這一棘手的狀況，勞動黨中央領導人一方面向中國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發出援助請求^⑦，另一方面加緊推行鞏固北方的三大工作：努力實現經濟復蘇、組織農民發展合作互助生產、加強鎮壓反革命份子^⑧。在此過程中，儘管得到了來自社會主義各國的無償援助，但北越並未認真考慮國內的現實情況，而是提出了在短期內建立重工業的任務，忽略了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以及與此相關的輕工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問題。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開工不足甚至被迫停業，一方面造成城市失業者的增加，另一方面也對日用消費品的生產和內貿產生不良影響，導致北越在1956年下半年出現商品短缺局面；棉布、服裝、糖、藥品、紙張、自行車等消費品的供應嚴重不足，加之深受通貨膨脹的困擾，使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出現明顯下降^⑨。

1956年北越國民經濟建設遭遇的挫折，迫使勞動黨中央領導人不得不暫時放緩推動越南統一的步伐。與此同時，在蘇聯共產黨二十大確認了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和平共處」路線之後，社會主義各國已經普遍接受了同資本主義陣營展開和平競賽的現實，在社會主義陣營掀起建設大潮的影響下^⑩，無論是中國還是北越，都同樣希望在穩定的局面下實現國民經濟大步向前發展，跨越和趕超資本主義國家。周恩來在1956年11月訪問河內時即告誡勞動黨中央領導人，有必要對人民進行解釋工作，要認識到越南統一問題的複雜性，而目前應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鞏固北方的人民民主主義制度上^⑪。

在此背景之下，優先鞏固北方逐漸成為勞動黨內部的主流意見。北越領導人開始頻繁強調要集中精力「團結和領導全民鞏固強大的北方，逐步邁向社會主義」^⑫，將1957年的工作重心放在完成經濟恢復任務上，如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增加糧食和各種消費品生產^⑬。是年12月，在勞動黨二屆十三中全會上，胡志明正式提出人民民主民族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齊頭並進的戰略，並闡明北方進入社會主義對於確保在統一鬥爭中取得勝利的現實意義^⑭，由此宣告了北越即將從三年恢復時期邁入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標誌着北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三年建設計劃的開端。

隨着三年建設計劃拉開帷幕，北越也亟待社會主義盟友特別是中國的進一步援助和支持。1958年1月20日，北越政府派出以商業部長潘英為首的經貿代表團抵達北京，商討新的援越項目事宜。到3月底，雙方簽署文件，中國政府批准幫助北越建設和改建第二期價值7,000餘萬元人民幣的十八個工業企業項目^⑮。在華訪問期間，北越代表團前往上海等工業城市參觀，深受中國建設形勢鼓舞，因而進一步提出了二十八個工業項目清單，請求中國予以支援。在代表團離京前，副總理陳毅告訴越方，對越南的幫助就像做自己的工作一樣，越南在前線，前線的工作做好了，後方才能鞏固^⑯。

中方對北越援助請求的慷慨允諾並不奇怪，因為從1958年中開始，中國共產黨正在雄心勃勃地實施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計劃——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化運動。自1957年莫斯科會議後，一直試圖在經濟建設上趕超蘇聯的中國領導人相信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直接途徑，並且認為中國的模式將會比蘇聯更快更好。中共迫切希望自己的這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能夠得到兄弟黨的認同，特別是在蘇共對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的「三面紅旗」方針表現出沉默、懷疑和反對的情況下，中共領導人在密切注視着蘇共觀點的同時，也在努力爭取更多的追隨者，以提高自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⑰。其中勞動黨作為東南亞地區唯一已奪取政權且正在效仿中國經驗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產黨力量，自然成為中共尤為關注的幾個兄弟黨之一。可以說，正是由於中越兩國兩黨各自的現實需要，從而形成了中國大躍進的影響在北越迅速擴展的推力。

二 北越學習大躍進的熱潮

1958年6月底，在中國休假逗留了近一個月的胡志明返回國內。胡剛下飛機，就把前來迎接他的幾位中央委員召集起來，談了兩個多小時在中國的見聞。當有人對中國大躍進的情況表示驚訝時，胡立即激動地問：「難道你還不相信嗎？」^⑱從7月1日開始，胡以「陳力」為筆名，在勞動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報》發表題為〈值得我們學習的中國的幾點經驗〉的專文，分十個題目系統介紹中國工農業大躍進，引用了不少典型事例，有地點、人名和數字，寫得相當具體生動，連載了一個多月。隨後在出席人民軍高、中級幹部大會和全國工農兵勞模大會時，胡均以相當長的時間介紹中國大躍進。7月上旬，胡先後

到興安、山西、北寧三省視察，每到一處就向當地幹部和農民介紹中國農村在水利、施肥和改進耕作技術方面的成就。胡曾在一個社裏問農民：「今年晚造每公頃施肥多少？」答稱：「兩噸半。」胡接着說：「中國農民弟兄每公頃施肥七十多噸」，然後用指頭刮着臉皮說：「你們覺得害羞嗎？」^{①9}

胡志明對中國大躍進的極力推崇，迅速在北越國內形成一個風潮。自7月以後，北越各種報刊大量登載有關中國大躍進的消息和文章。僅在《人民報》上，8月即刊登了達二十篇之多。中國大躍進開始成為愈來愈多北越幹部所關心的話題，在與中方人員接觸時，他們每每主動問及大躍進的情況，其中高級幹部多關心如何在國內運用中國大躍進的經驗，中下級幹部常常是開始不信，繼而驚訝，最後讚歎不止，但還是認為難以理解；有些幹部抱着半信半疑的態度。如《人民報》在刊登了中國早稻高產的消息之後，很多讀者都不相信，寫信問報社是不是把數字弄錯了，多寫了兩個零^{②0}？針對這一情況，胡再次親自撰文說明，中國農業大躍進的情況均屬事實，糧食高產的數字均經幹部、專家仔細驗收，察看無誤，應可確信無疑。同時，胡還提出越南也應當有自己的指標，比如稻穀單位面積產量如能達到中國試驗田的百分之一，即每公頃達到3噸多，就算是初步勝利^{②1}。

胡志明的積極態度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其身邊的其他領導人。包括長征、黎笋、武元甲、阮志清等勞動黨中央領導人紛紛主動向中國駐越使館索取中國大躍進相關材料，並陸續前往中國中部和南部省份進行實地考察。特別是在9月，勞動黨政治局委員黎笋和黃文歡藉着在廣州休假的機會，積極要求參觀和安排座談，了解中國工農業大躍進的經驗。在參觀時，黎笋表示要先學習中國的「土辦法」，然後再學習蘇聯的「洋辦法」。他對街道辦工業、水稻大面積高產、沼氣發電等尤感興趣。甚至對於小高爐煉鋼，兩人都認為這種土辦法很好，可以在越南試辦，也要派幹部來學習^{②2}。

黎笋和黃文歡回國之後，對中國的情況讚揚備至，表示深受感動，收穫很大，並強調越南也得快步前進，大鬧革命。隨後，勞動黨中央領導人開始在多個場合着力宣傳中國的建設經驗，尤其是對農業大躍進，越方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認為是「給我國和世界人民開闢了發展農業的非常燦爛的前途」，號召向中國學習，把越南的農業生產向前推進一步^{②3}。受到高層的鼓舞，自1958年下半年開始，北越各省的村、社紛紛修改秋稻收穫指標，至9月，18個省的7個村和155個社的指標屢被突破，有的社把指標提高到每公頃7噸。北越各省紛紛採用中國並禾密植的經驗「大搞試驗田」，開展「淨村肥田」積肥運動，擴大興修水利。9月、10月兩個月內，勞動黨中央召開兩次冬春生產會議，要求各地以「躍進」精神訂出明年早造產量指標，經過層層討論，不少地區訂出的指標都翻了幾番，最高達到一公頃收稻穀13噸^{②4}。

在工業方面，北越工業部長黎清毅從中國參觀回國後，連續兩個月到處作報告，宣傳在中國所見所聞。他竭力主張學習中國「多快好省」的建設經驗，提出研究中國「大中小結合」和「土洋並舉」的辦法，加速越南的工業建設。在幹部下放參加體力勞動方面，北越從總理到省委書記的各級幹部紛紛

參加義務勞動，各大學、專科師生也下放到工地和農村勞動兩個月。在10月10日的人民軍全軍生產會議上，總理范文同提出：「我們還沒有條件像中國一樣躍進，但是我們必須跑得快，跳得遠，準備躍進，並且一定要躍進。」^{②⑤}

「學中國，趕中國」的局面在北越的迅速鋪開，無疑是中方所樂於見到的。作為向勞動黨施加影響的重要舉措，在這一時期，更多不同類別的北越代表團被邀請訪問中國，並受到熱情接待，以便中方詳盡地介紹自己的經驗和教訓。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國駐越工作的領導幹部也被要求向北越有關人員「下毛毛雨」，有目的地介紹中國對時局問題的看法和貫徹執行總路線的一些做法，以加深兩國的相互了解^{②⑥}。此外，在勞動黨高層中，也普遍存在着樂觀情緒，認為中國與越南國情相近，中國大躍進給越南帶來的振奮遠超過蘇聯衛星上天，前者幫助他們解放了思想，看到自己的力量和未來的遠景，增加了無限的信心。在9月下旬的冬春生產會議上，范文同說，越南土地潛力很大，只要按中國的方法稍加深耕密植，多施些肥料，產量馬上能夠增加、翻倍。黎笋則告誡各省幹部，應當把越南當作中國的一個省來看待，要努力趕上中國的一個省，至少廣西省能做到的，越南也要能做到，越南的條件並不比兩廣差；此外，他還在多個場合上說過：「人家〔中國〕這樣慷慨幫助我們，我們再不趕上去，就太沒臉了。」^{②⑦}

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越的「躍進」工作以更加迅猛之勢展開。在9月冬春生產會議後，北越許多省對於能否完成指標存在疑慮。10月中旬，勞動黨中央領導人紛紛到各省動員，用中國的事例解除幹部思想顧慮，在省、縣、鄉等級層層展開辯論。到10月下旬，各省、縣、鄉都接受了中央的意見，認為以前的指標太保守了。隨後，它們紛紛調整農業生產的計劃指標，有的社甚至提出一年內實現早造增產十四五倍。為了滿足新的生產指標，勞動黨中央在急切之下還打電報給蘇聯，請求盡快援助25萬噸化肥，為來年的「躍進」提供保證^{②⑧}。

在工業方面，北越在1958年下半年陸續向中國提出援助六十七個工礦項目的要求，這些項目雖然已經被列入三年建設計劃，並以經國會通過、已向全民公布為由，希望在三年之內基本建成^{②⑨}，但越方仍要求在1960年完成大部分項目，小部分在1961年完成。對於越方如此迫切的要求，中國領導人甚至感到有些吃驚，並建議將項目數額壓縮到五十一個。在1959年2月同北越政府經濟代表團會面時，周恩來告誡代表團團長黎清毅，中國在工業上之所以能躍進，是因為：第一，歷史上有一些重工業底子；第二，第一個五年計劃為重工業打下了基礎。而越南過去工業很少，這方面的基礎較為缺乏。沒有這種底子，不可能設想很快完成指標。對此，黎作出了檢討，指出越南的工業計劃中有一些主觀主義的東西，主要源於對國內情況估計不足，對經濟建設的複雜性認識不足^{③⑩}。

上述談話反映出一個現實，即中越雙方的領導人都認識到，作為國民經濟建設中十分複雜、技術性要求較高的一個門類，越南尚不具備在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領域迅速展開「躍進」的條件。相比之下，農業領域的門檻則相對較

低，特別是在北越領導人相信中越農業生產的基礎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優先在農業生產中實現「躍進」自然是可行的。當然，這也是有限條件的，至少在一部分北越領導人看來，要真正實現中國式的農業大躍進，此時在北越國內依然存在着限制因素，那就是農業的合作化改造目標還遠未實現。

三 北越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出現

就在勞動黨中央大力推行「中國經驗」、「加快步伐向前趕」的同時^⑳，北越一些領導幹部表達了質疑的聲音和看法。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如下：中央委員陳友翼、裴公澄等人認為，越南沒有實現合作化的基礎，很多農村黨員帶頭走資本主義道路，鬧退社、退互助組，自己去做生意；不先做好合作化和爭取農村支部的支持，「躍進」是難以實現的。同樣持懷疑態度的還有曾在土改期間因支持「左」的路線而遭受處分的副總理長征。他表示中國已經完成合作化改造，等於砍斷了一切束縛，思想輕鬆，可以實現大躍進，而越南還有許多繩索束縛着，不能像中國那樣大張旗鼓；學習中國的經驗之餘要照顧越南的特點，量力而行，否則可能犯機會主義的錯誤，把好事辦壞^㉑。

上述不同聲音突出反映了勞動黨高層已經意識到要像中國那樣進行大躍進，必須以完成合作化運動作為保障和後盾。事實上，自1955年進入三年恢復時期後，在北越農村的老土改區，以變工互助為主要組織形式的合作勞動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到1956年6月，全北方已有變工組（互助組的初級狀態）十九餘萬個。但隨着9月勞動黨二屆十中全會確定將土改糾偏作為中心任務之後，北越農村由於清算整黨而出現不穩定局面，變工組的活動也陷入癱瘓狀態^㉒，這種局面甚至一直持續到社會主義改造業已開始的1958年。在中國駐越使館對1958年春夏北越糧食大幅減產的主要原因的分析中，就認為一方面是土改糾偏影響了農民對黨的信任，基層群眾生產情緒不高；另一方面是變工組的數量增長遲緩，同時向互助組發展的趨勢停滯不前^㉓。當然，無法實行「躍進」還與勞動黨中央領導人的認識有關，甚至胡志明本人在1958年上半年還堅持認為當時越南農村只能建立變工組，兩三年後再進行合作化，想很快推動合作化是不行的^㉔。

不過，這一切都隨着學習中國大躍進浪潮的到來而發生改變。黎笋在1958年9月從廣州回國次日，在北越農業生產會議上即提出，中國做得到的事情，越南也應該做得到，根本的問題在於提高社會主義覺悟，鼓足革命幹勁；越南的物質條件不比中國差，不同的只是中國已經實行合作化，越南還沒有開始實行。范文同也表示，在農業生產方面，中國把越南拋得太遠了，一定要加快步伐往前趕，而要往前趕，就必須迅速解決農業合作化問題和幹部的思想問題^㉕。在10月的政府工作會議上，胡志明也做了檢討：「過去我們思想保守了，看到困難太多，有利條件太少，因而在三年計劃中提出主要是發展互助組，農業社僅要求達到佔總農戶的20%。現在必須修改，應迅速組

織北方現有的192,556個互助組(佔總農戶的46%)加入農業社；未組織互助組的地方，可直接組織農業社，不必再經過互助組階段。」^⑳

隨着勞動黨中央領導人作出明確表態，自1958年10月以後，領導幹部一反過去認為「合作化不能發展太快」的論調，紛紛提出必須加緊發展互助合作運動的主張，要求必須迅速解決農業合作化問題。10月23日的《人民報》社論提出：「農業合作化是當前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務。」^㉑在中央領導人不斷到各地視察並進行具體指示的同時，各地黨委也派出大量幹部下鄉直接領導生產和合作化運動。各省隨即根據中央指示，訂出比過去速度快得多的發展計劃，如清化省就打算在兩個月內將農業合作社從173個發展到758個^㉒。除了自上而下的大力推動，在胡志明的親自指導下，越方還組織了包括從中央到縣的主要幹部的農業考察團，花了一個半月時間在中國兩廣地區深入考察大躍進和合作化的經驗。據說參觀收穫很大，有北越幹部稱，「到此只有一個半月，成效等於15年」，表示回去一定要學習中國的經驗，實現農村工作的大轉變^㉓。

受全國形勢影響，加之1958年11月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在訪問河內時介紹了關於朝鮮「千里馬運動」的情況，也在相當大程度上觸動了越方^㉔。於是在11月底，勞動黨二屆十四中全會決定全面修改原來的三年建設計劃，修改後的計劃所規定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比原定計劃大大提高，要求在1960年內基本完成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工作^㉕。在此次會議期間，胡志明及范文同分別向勞動黨高級幹部和國會做了報告，都強調三大改造的重要性，特別強調農業合作化的急迫性，將農業合作化明確為三大改造的主要環節，要大力先抓這個環節。按照原定計劃，1958年北方至少要組成200個初級合作社，但年底僅清化一個省就組成了2,000個。與此相應的是，工農業產量指標也大幅攀升，如1960年的稻穀產量指標原定為474萬噸，現改為760萬噸，比1957年產量指標增加了93%(每年平均增長25%)^㉖。

能夠反映勞動黨中央領導人此時急迫心態的還有1958年12月底在清化省召開的現場會議。在此次會議上，黎笋坐鎮主持，各省委書記全部出席，旨在討論建立合作社是多而快好還是少而慢好。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合作社成立得愈多愈快，所產生的積極健康的影響就愈大^㉗。而從實際情況來看，勞動黨希望通過農業合作化浪潮想要達到的目的，顯然並不僅限於農業生產，特別是在1959年2月，勞動黨中央書記處發出的〈關於加強對小商販、流通攤販和零售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指示〉，進一步凸顯出北越領導人希望借助農業合作化來推動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的總體目標^㉘。4月，在勞動黨二屆十六中全會上，胡志明等領導人迫不及待地對外宣布，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取得的成績，為北方山區的民主改革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打下充分的基礎。另外，根據此次會議上公布的數據，原先作為農業合作化先進典型的清化省此時已被永靈、山西、河靜等地趕上甚至是遠遠拋在後面，可以說是全國形勢一片大好，合作化運動如火如荼^㉙。

然而，在農業合作化運動跨步前進的壓力面前，並非沒有不同的聲音。特別是高指標所帶來的超負荷勞動，導致基層幹部和群眾在思想上不能全盤接受，認為「這樣搞法等社會主義建成時，人都都累死了」，「共產主義就是要人累得像牛馬」^{④7}。北越領導層也注意到地方幹部群眾對合作化任務的消極抵制並非個例，有不少幹部不願宣傳合作化政策和拒絕農民的入社申請，甚至故意誇大合作社困難、縮短申請期限為實行合作化製造阻礙，有的地方以「穩步前進」、「民族習慣」、「條件困難」為藉口索性不發展合作社^{④8}。而伴隨着農業合作化大力推行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也引發了相當大的反彈，大中城市私營工商業紛紛關門停業、停止周轉運輸、供應生活必需品^{④9}。由此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城市市場供應情況普遍緊張，不得不進行限量供應，排隊購物現象十分普遍^{⑤0}。

除此之外，另一個令越方感到不安的消息是：中國的共產主義建設試驗產生消極後果。時值1959年8月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召開，中國對年度生產指標的調整和反右傾運動中彭德懷、黃克誠的去職，令北越幹部群體震驚不已。而不少在中國留學和實習的越南學生和幹部，在信中紛紛提到中國物資供應非常緊張，連糧食、蔬菜、肥皂都供應不上，要求家裏寄送物資^{⑤1}。與此同時，來自中越邊境地區的報告顯示，從1959年上半年開始，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入境投靠其越南親戚尋求飽食，並盡可能地購買肉類、餅乾等帶回國內^{⑤2}。這些現象導致有相當部分的北越幹部和民眾對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產生懷疑。與此同時，開始有關於蘇共和中共對人民公社問題在看法上出現分歧的風聲傳出^{⑤3}。

但從勞動黨高層的態度來看，北越領導人仍努力向中方保證，勞動黨的高、中級幹部，絕大部分是相信中共和毛澤東在處理東方革命、特別是農村問題上，要比任何其他兄弟國家有辦法，「黨中央對這個問題看法上是明確的」；並批評了少數幹部因不明真相或受西方宣傳影響，對中國路線的優越性產生的「一定程度的疑慮」^{⑤4}。9月中旬，河內還專門召集了一個半內部的高、中級幹部會議，針對部分幹部當前對中國存在的思想問題，作了詳細的解釋，着重向各省幹部闡明，在大型的革命運動中是不可能沒有一點偏差的，無論蘇聯、中國還是越南都有過偏差，這是不足為奇的；黨的路線必須堅決保護，不容破壞；中共是在克服各種錯誤偏差當中成長起來的，應當對中共和毛澤東有足夠的信心^{⑤5}。

儘管北越在內外宣傳上仍堅持既有的口徑，但來自中國的消極信息和在國內實踐中出現的阻力，不可避免地給勞動黨中央領導人的信心帶來影響。9月8日，勞動黨中央發出指示，稱目前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接下來重點是對已有的合作社進行鞏固，其中一個工作重點是對農村黨員幹部進行整訓，對於一些地方上正在進行的合作社建設可以暫緩，待整訓完成後再繼續建設^{⑤6}。12日，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總結會議上，胡志明告誡與會幹部，是時候對已有的農業合作化成果進行鞏固，如果不改善其中做得不好的地方，必然會對全域工作造成損害^{⑤7}。這些指示和講話實際上表明北越的農

業合作化運動在經過半年左右的高速運作後，開始有意識地放緩調整，而從接下來的情況來看，這儼然是一個預示着「躍進」趨勢正在降溫的信號。

四 北越「躍進」的降溫與中蘇關係

進入1960年，勞動黨中央曾在2月發出雄心勃勃的號召，要求為超額完成1960年計劃，並為第一個五年計劃（1961-1965）準備條件，計劃發動三個階段的大規模生產競賽運動，旨在為胡志明七十壽辰及建國十五周年獻禮。但從3月底開始，逐漸顯現出來的一個殘酷現實是，北越的早稻生產出現了嚴重歉收，稻米產量比上一年下降24%，有的省份甚至減產一半以上，這直接影響到國家的糧食收購和畜牧業養殖計劃。市場糧食及副食品供應量的減少，導致社會上恐慌和悲觀失望的氣氛瀰漫；同時，工業生產由於原材料供應方面遇到困難，大量國營工廠出現停工待料現象^⑤。此時在中越邊境省份，由於缺乏糧食和食品，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入境越南（有時一天即有幾百人）尋求幫助或用工業品來交換糧食，致使北越境內糧食和食品價格迅速上漲，黑市交易和走私現象愈發猖獗^⑥。以上狀況對勞動黨和北越政府產生了極大壓力，特別是在建國十五周年和勞動黨即將召開三大之際，一旦發生糧荒，必將產生不好的政治影響。為此越方不得不在7月中旬向中方請求暫借大米8萬至10萬噸，以供備用^⑦。

對於1960年上半年國民經濟出現的嚴重困難，勞動黨給出的公開解釋是乾旱持續和氣候失常。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在高生產指標下強行推進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顯然也是挫傷基層農民和幹部生產積極性的重要原因。一個明顯的跡象就是：出於對加入農業合作社的反感，農民紛紛宰殺耕牛，僅僅在1960年第一季度就達到15,000頭，大大超過北方恢復和平以來的歷年數字，這對於嚴重依賴畜力的北越農業生產來說不啻為一個沉重的打擊。除此之外，農民普遍不願把糧食賣給國家，紛紛要求減稅，轉而把稻米、家禽等糧食以至手錶、自行車等日常用品拋向黑市；一些基層合作社頻頻出現社員退社現象，導致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⑧。

根據中國駐越使館的觀察，北越領導人對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生產遭遇的挫折深感憂慮。勞動黨中央書記處專門召開會議，一方面通過宣傳和負責人發表談話等方式，不斷為人民打氣，請人民不要悲觀失望，爭取通過秋稻生產彌補損失；另一方面，包括胡志明在內的中央領導人和各省領導幹部紛紛深入農村，分片負責，下至田間，具體指導秋稻生產。在這一過程中，儘管越方並未公開表示要對路線方針進行檢討，但中方已經注意到越方對於「躍進」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比如在1960年初發動的「青年千斤肥」和「積肥健將」運動，其口號已經改為「全面健將」，較高的積肥指標被取消，相應地「比趕超」的競賽意味也大大降低，理由是避免太過火，影響其他工作^⑨。3月，勞動黨中央召開全北方農業合作會議，着重批判合作社存在的問題和缺點，特

別強調要繼續鞏固合作社，只應適當發展，不應發展太快。依照這一精神，北越各省開始批判急躁情緒，紛紛降低計劃指標。中央領導人相繼批示，指導地方堅決不批准一些不夠條件的地方建立新社，同時要求各省委繼續檢查，克服一些縣、鄉幹部貪快、圖大、追求數量，忽視質量的傾向⁶³。

對於勞動黨和北越政府的以上舉動，中共領導人存在着不同看法。在中方看來，這些行動沖淡了整個運動的意義，實際上起到了消極限制的作用，群眾的熱情受到了挫傷；甚至還認為1959至1960年冬春出現災荒的根本原因在於領導人比較保守，群眾的生產幹勁沒有充分發動起來，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跟不上，未能形成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⁶⁴。而更讓中方感到意外的是，到1960年中，北越官方的報刊和電台中有關中國「三面紅旗」的宣傳報導陡然減少，也很少再發表評論，有關越南學習中國經驗的內容更是隻字不提⁶⁵。種種迹象表明，在1960年上半年，北越效仿中國大躍進的熱情出現了自上而下的降溫和明顯的冷淡疏遠。

同之前大張旗鼓地向中國學習的勢頭相比，北越的經濟糾偏措施和宣傳方向調整，顯示出北越領導人一直以來在路線方針上緊密追隨中國的思路已經出現鬆動。出現這種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無疑來自於中國國內已經暴露的種種問題。而1960年上半年北越的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生產遭遇嚴重挫折，似乎進一步印證了北越正在重蹈中國的覆轍，這些情況不由得令北越領導層更加警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越方這一時期的「躍進」降溫進行得相當低調。特別是同1957年土改糾偏工作相比，勞動黨中央和北越政府並沒有出台任何具體的糾正指令，但可以想見的是，這樣做的一個重要考慮是避免令中方陷入難堪的境地；當然，從更深層次的原因進行分析，勞動黨中央領導人態度的變化或許還有另外的考慮。

如前所述，自1958年末起，中共開始急劇加強同一些兄弟黨的聯繫，着力宣傳與蘇共經驗相左的觀點，其中人民公社的理論被宣稱為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得到了特別的強調。這種做法在莫斯科方面看來，是中共在以「很不正當的方式」拉攏一部分兄弟黨，從而排擠蘇共以取得在國際共運中的領袖地位⁶⁶。儘管此時中蘇嫌隙已生，但在雙方都隱而不發的狀態下，國際共運表面的團結局面仍得以維持，這也正是北越能夠學習中國、高調開展「躍進」試驗的背景。事實上，自1958年二屆十四中全會以來，勞動黨始終把蘇聯和中國同時視為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趕超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堅力量。在實踐中，勞動黨中央領導人多次表示，中國的經驗要學，蘇聯的經驗也要學⁶⁷，同時還認為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功與蘇聯領導下社會主義陣營的幫助是分不開的⁶⁸。這充分表明，北越學習中國經驗的初衷，更多地是考慮自己的現實需要，而並非要在中蘇路線之爭中選擇站隊。

但隨着中蘇兩黨之間有關路線問題的分歧逐步擴大，直至1960年公開化，外界已無法繼續用單純的經濟建設考量來看待勞動黨和北越政府對「躍進」模式的效仿。特別是蘇方認為，勞動黨中央領導人同意中共關於總路線和大躍進的口號，導致其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犯了嚴重錯誤，由於盲目追求數量，忽視在增加農產品生產中對社員的物質刺激原則的重要性，致使農村的社會主

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遇到嚴重困難，影響農村和城市居民的供給。蘇方相信，正是由於中共領導人對勞動黨中央的思想工作，以及北越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施加了明顯的影響，才導致許多勞動黨中央領導人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傾向於中國的經驗，在許多問題上照搬照抄中共的工作形式和方法^⑥。1960年8月，胡志明先後親自前往北京和莫斯科，提出〈越南勞動黨向蘇中兩兄弟建議的幾點意見〉，意圖在中蘇之間擔任說客進行勸和。在同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的會面中，蘇方曾直言不諱地向胡指出中蘇兩黨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存在不同看法，其中就包括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問題，並批評這些「新東西」的出台沒有事先通知蘇聯^⑦；蘇方還告訴胡，中國領導人的做法是在重複斯大林的錯誤，中國人想要越過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發展的整個階段，是不可能做到的^⑧。

蘇方對中國式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明確質疑，使得勞動黨中央領導人進一步看清了中蘇之間矛盾衝突的焦點所在和北越自身的處境。胡志明在回國之後即強調，絕不能讓即將召開的勞動黨三大開成羅馬尼亞工人黨三大（即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中蘇雙方代表在該會議中發生激烈衝突），要求對國際問題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務必要避免談某些爭議問題，特別是涉及中蘇分歧的問題^⑨。而作為分歧的具體表現之一，中國式的「三面紅旗」模式至此已成為勞動黨諱莫如深的內容，在這樣的局面下，繼續宣揚和推行「躍進」方針顯然已不合時宜；為了避免引起中方不快，唯有讓這場運動迅速降溫，才能最大限度地迎合北越在中蘇間互不開罪的立場。

1961年4月底，勞動黨中央召開三屆四中全會，主要討論中央委員會工作中出現的錯誤和缺點。其中重點反思了在農業領域出現的問題，對機械執行行政命令、打壓農民生產積極性、對地方和基層反映的情況反應遲緩等現象進行了點名批評。全會還批評了片面追求農業合作化百分比的做法，並總結認為產生錯誤的根源在於沒有認識到進行實際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沒有將馬列主義的原理同越南的具體條件相結合，特別是「在學習兄弟國家經驗的過程中存在簡單、機械的傾向，沒有通過深入研究將經驗創造性地應用於越南的具體環境」^⑩。儘管在這一過程中並未明確提及中國，但根據越方與會人員的透露，會議中所批評的錯誤實際上指的就是中方的經驗^⑪。從這個意義來說，此次會議實際上是對北越學習中國大躍進浪潮的一個定性和總結，而會議採取的以自我批評為主的表述方式，也顯示出勞動黨對待該問題的謹慎小心。

三個月之後，在7月底討論農業五年計劃的五中全會上，勞動黨中央重新確定了農業發展的前景、任務和方向，有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農業合作社社員福利、改進對農業合作社的領導等政策，已經全然排除了「躍進」時期的指導思想。只是在對之前的農業領導工作進行評判時，與會者依然遵循了隱諱的口徑，僅是泛泛指出當時「對農業問題的認識太簡單，對國家的現實形勢認識不清，時而犯保守主義的錯誤，時而又犯教條主義的錯誤」^⑫。在蘇方看來，這種迴避深入揭露重大缺點和錯誤的一般性提法是北越擔心開罪中國的表現，但蘇方也通過與越方接觸而了解到，勞動黨高層對於優先學習

中國經驗的看法已經發生動搖^⑥。儘管從整體來看，中越合作關係的大局並未由此受到撼動，但「躍進」模式在政策層面上被北越官方最終放棄的事實終究是一個信號：中越兩黨兩國間曾被視為「特殊親密」的關係正在經歷一個深刻變化的過程^⑦。

五 結語

從實際情況來看，北越大張旗鼓地向中國的大躍進運動進行學習，自1958年下半年算起持續了大約一年時間。總體來說，這一過程給北越帶來的最直接影響是加速推動了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特別是農業合作化的提速，帶動了其三年建設計劃和發展經濟的任務基本得以按時完成。到1960年8月中，勞動黨中央書記處宣布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轉入以發展為主的階段，在三個月內即可基本完成^⑧，同時北方的二十四個主要工礦企業也分別提前四到九個月完成三年建設計劃的生產目標，對勞動黨中央產生了相當大的鼓舞^⑨。由此不難看出，1958至1960年間高速「躍進」的嘗試給北越國民經濟建設所帶來的並非全是令人沮喪的挫折，至少在某些經濟領域中，北越極度虛弱的經濟狀況在短期內有了明顯改觀。

因此實事求是地說，北越的「躍進」試驗在一定程度上確為國民經濟從三年恢復向三年建設計劃過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由於方法上的照搬及操作中的失誤等原因，也留下了深刻的挫折教訓，其中較為突出的是農業生產領域。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負面影響與大躍進在中國國內造成的結果相比，顯然付出的代價更小。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於，儘管在北越曾經自上而下地為準備「躍進」製造出相當大的聲勢，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勞動黨中央領導人最初極力推崇中國大躍進經驗的想法相對簡單，即認為在工農業生產中借鑒中國的技術措施，再加上下達指標以帶來壓力就可以取得成功^⑩。而隨着黨內意見的變化，北越領導層決定先重點完成農業合作化改造，進而為接下來的「躍進」提供保障；在「躍進」運動實際上尚未真正深入鋪開的情況下，中國的大躍進模式所產生的弊端已經顯現，從而使得北越領導層有所察覺，進而結合國內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及時放棄一些過激的、可能引發負面結果的路線主張。

除此之外，北越之所以在1960年刹住原本熱火朝天的「躍進」步伐，還必須考慮到國際共運路線紛爭的大背景。北越領導人已經預感到繼續公開支持中國的大躍進路線可能會給自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處境帶來不利的影響；可以說，對中國大躍進路線的效仿成為了勞動黨和北越政府主導下大規模學習中國革命和建設模式的最後一次嘗試。在此之後，勞動黨中央領導人開始更多地強調中間道路和獨立自主的重要性，中越兩黨兩國之間潛在的依附因素遭到剝離，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在「同志加兄弟」的表象下卻刻意保持距離的影響深遠的關係模式。

註釋

- ① 關於中國的大躍進運動在國際上的影響，已有研究更多是從大躍進的國際背景，特別是中蘇關係的角度進行考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大躍進和中國對外政策的革命性轉變〉，《冷戰國際史研究》，2008年第3期，頁45-96；武國友：〈社會主義陣營的和平競賽大潮與中國的「大躍進」運動〉，《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3期，頁49-58；孫其明：〈中蘇關係的演變與中國經濟——二論中蘇關係惡化對中國的影響〉，《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頁1-9。至於大躍進對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產生的影響，目前有沈志華：〈「大躍進」與「千里馬」：中朝攜手奔向共產主義〉，《領導者》，第69期（2016年4月），頁32-40；馬力：〈保加利亞「引進」中國「人民公社」初探（1958-1959）〉，《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研究》，第10輯（2016年12月），頁299-309等研究。而對於北越相關情況的考察，尚未見諸文獻、報章。
- ② 越南勞動黨多以「北方」、「南方」稱呼南北分治下的越南。本文提及「北方」、「南方」，均指代北越、南越。
- ③ 有關越南共產主義者早期學習中國革命經驗的研究論文，參見趙桂蘭：〈50年代越南對中國革命經驗和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周口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頁11-14；黃錚：〈胡志明在中國的革命活動與20世紀越南民族的獨立〉，《東南亞縱橫》，2000年第S2期，頁1-5，等等。
- ④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加強領導防止饑饉，解決饑民問題的指示〉，載《黨文件全集》，第十六冊（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02），頁241。
- ⑤ Willard J. Webb,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the Prelude to the War in Vietnam, 1954-1959*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Joint History 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2007), 101-102, 105.
- ⑥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中央關於繼續粉碎帝國主義者挑起匪患陰謀的指示〉，載《黨文件全集》，第十六冊，頁253-54。
- ⑦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於越南要求中國派遣專家和技術人員協助越南工作的往來文件和照會〉（1954年12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以下簡稱「外檔」），106-00019-01，頁5；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同越南政府代表團進行談判的指示〉（1955年4月17日），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22, оп.8, п.117, д.30, л.12-21。
- ⑧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中央第八次會議關於當前國內外形勢及統一任務的決議〉，載《黨文件全集》，第十六冊，頁567-80。
- ⑨ 蘇聯外交部情報部：〈關於越南國內局勢的調研報告〉（1957年1月5日），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22, д.485, л.1-16。
- ⑩ 武國友：〈社會主義陣營的和平競賽大潮與中國的「大躍進」運動〉，頁53-54。
- ⑪ 蘇聯駐中國大使館：〈1956年工作報告〉（1957年4月22日），АВПРФ, ф.5, оп.28, п.103, д.409, л.1-252。
- ⑫ 〈阮維楨談越南勞動黨今年的新任務〉，《各國共產黨簡況》（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內部資料），第43期（1957年3月），頁8。
- ⑬ 〈長征談越南人民1957年的任務〉，《各國共產黨簡況》，第28期（1957年2月），頁5。
- ⑭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3次會議關於統一思想，團結全黨全力完成當前工作任務的報告〉，載《黨文件全集》，第十八冊，頁800-804。
- ⑮ 對外貿易部辦公廳：〈關於簽訂援助越南建設18個工業企業項目協定的請示報告及附件〉（1958年3月16日），外檔，106-00380-02，頁8。
- ⑯ 對外貿易部對外經濟聯絡局：〈對外經濟聯絡局駐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處談話記錄〉（1958年5月5日），外檔，106-00210-02，頁11。
- ⑰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210-15、298-99。

- ⑱⑲⑳㉑ 中國駐越使館：〈胡主席回國後對我國大躍進的情況宣傳〉（1958年7月22日），外檔，106-00443-07，頁45；45；47；46。
- ㉒ 〈越南對我國大躍進的反應〉，《各國共產黨簡況》，第191期（1958年9月），頁3-4。
- ㉓ 中國駐越使館：〈關於胡主席著文宣傳中國的大躍進〉（1958年9月3日），外檔，106-00443-07，頁51。
- ㉔⑳⑳⑳ 〈越南從各方面學習我國大躍進的經驗〉，《各國共產黨簡況》，第201期（1958年9月），頁6；6-7；6。
- ㉕⑳⑳ 中國駐越使館：〈我國農業戰線上的大勝利對越南幹部農民產生的影響〉（1958年10月9日），外檔，106-00443-07，頁52；53。
- ㉖⑳⑳⑳ 〈越南工農業等方面開始躍進〉，《各國共產黨簡況》，第203期（1958年11月），頁6-7；6-7；6。
- ㉗⑳⑳ 中國駐越使館：〈1958年越南基本情況和中越關係〉（1959年1月），外檔，106-00444-01，頁3-4；2。
- ㉘⑳⑳ 中國駐越使館：〈中國躍進對越南的影響〉（1958年11月2日），外檔，106-00443-07，頁58。
- ㉙⑳⑳ 中國駐越使館：〈越勞對越南能否很快躍進看法不一致〉（1958年11月2日），外檔，106-00443-07，頁56；56-57。
- ㉚ 對外貿易部：〈關於我與越南經濟代表團談判情況〉（1959年1月22日），外檔，106-00445-01，頁2。
- ㉛ 對外貿易部：〈周恩來接見越南政府經濟代表團談話記錄〉（1959年2月18日），外檔，106-00243-01，頁3-5。
- ㉜ 〈越南農業勞動模範和變工組幹部聯歡大會情況〉，《各國共產黨簡況》，第71期（1957年6月），頁3。
- ㉝⑳⑳ 中國駐越使館：〈續報越南學習我國躍進經驗情況〉（1958年10月24日至11月2日），外檔，106-00443-07，頁54；55、60。
- ㉞ 〈越南農業考察團在我國考察後的反應〉，《各國共產黨簡況》，第210期（1958年12月），頁5。
- ㉟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中央第14次會議關於國民經濟發展改造三年計劃任務的報告〉，載《黨文件全集》，第十九冊，頁467-77。
- ㊱ 〈越南勞動黨十四中全會決定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各國共產黨簡況》，第212期（1958年12月），頁13。
- ㊲ 〈越勞中央召開現場會議研究農業合作社經驗〉，《各國共產黨簡況》，第219期（1959年1月），頁2。
- ㊳ 越南勞動黨中央書記處：〈關於加強對小商販、流通攤販和零售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指示〉，載《黨文件全集》，第二十冊，頁172-73。
- ㊴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中央第16次擴大會議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載《黨文件全集》，第二十冊，頁358-59。
- ㊵ 〈越南人民報反對農業合作化中的保守和冒進傾向〉，《各國共產黨簡況》，第222期（1959年2月），頁10。
- ㊶ 越南勞動黨中央書記處：〈關於加強對私營資本工商業管理，及時制止社會主義改造中一些逃避行為的指示〉，載《黨文件全集》，第二十冊，頁535-36。
- ㊷ 方毅：〈關於視察援助越南工程情況報告〉（1959年8月6日），外檔，106-00455-02，頁171。
- ㊸⑳⑳⑳ 中國駐越使館：〈越勞中央和高、中級幹部對八中全會等問題的反應〉（1959年9月21日），外檔，106-00444-04，頁16-17；16；17-18。
- ㊹ 越南民主共和國駐南寧領事館：〈關於1959年商務工作情況的報告〉（1960年1月4日），越南第三國家檔案館越北自治區行政委員會數據庫，296。
- ㊺ 中國駐越使館：〈越南對我八中全會的反應〉（1959年9月16日），外檔，106-00444-04，頁13。

- ⑤⑥ 越南共產黨中央書記處：〈關於執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指示的通知〉，載《黨文件全集》，第二十冊，頁729-30。
- ⑤⑦ 胡志明：〈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總結會議上的講話〉，載《黨文件全集》，第二十冊，頁752-53。
- ⑤⑧⑥②⑥④ 中國駐越使館：〈我駐越使館關於1960年4、5月份越南政治外交動態綜合報告〉（1960年6月10日），外檔，106-00531-04，頁28；29-30；29、31-32；28-29。
- ⑤⑨ 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北自治區：〈關於高平、諒山省與中國廣西省貿易關係的一些問題〉（1961年9月7日），越南第三國家檔案館總理府數據庫，7839。
- ⑥⑩ 中國駐越使館：〈我駐越使館關於1960年7月份越南政治外交動態綜合報告〉（1960年8月5日），外檔，106-00531-06，頁62。
- ⑥⑪ 中國駐越使館：〈我駐越使館關於1960年第1季度越南政治外交情況綜合報告〉（1960年4月25日），外檔，106-00531-03，頁22；中國駐越使館：〈我駐越使館關於1960年6月份越南動態綜合報告〉（1960年7月15日），外檔，106-00531-05，頁44。
- ⑥⑫ 中國駐越使館：〈越南對我人大會議的反應〉（1960年4月22日），外檔，106-00522-06，頁42。
- ⑥⑬ 蘇聯駐華使館：〈關於中共與兄弟黨關係的資料〉（1960年9月10日），РГНИ（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49, д.327, л.218-33。
- ⑥⑭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中央第14次會議關於世界形勢和我們的共同任務的報告〉，載《黨文件全集》，第十九冊，頁440。
- ⑥⑮⑯⑰ 蘇聯駐越使館：〈關於1960年莫斯科會議後越南勞動黨的動向〉（1961年10月17日），АВПРФ, ф.079, оп.16, п.31, д.3, л.35-57。
- ⑦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443-44。
- ⑦⑱ 蘇聯外交部：〈赫魯曉夫與胡志明談話記錄〉（1960年8月17日），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3, оп.64, д.560, л.140-65。
- ⑦⑲⑳ 中國駐越使館：〈我駐越使館關於1960年8月份越南動態綜合報告〉（1960年9月26日），外檔，106-00531-07，頁76；75。
- ⑦㉑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關於加強中央領導工作的決議〉，載《黨文件全集》，第二十二冊，頁353-54。
- ⑦㉒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農業發展問題的決議〉，載《黨文件全集》，第二十二冊，頁432-33。
- ⑦㉓ 根據蘇聯的觀察，中越之間的關係在許多方面往往超出了一般的社會主義政黨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中越都傾向於強調雙方共同的歷史遭遇、相近的血緣和地緣關係，以及類似的國家建設條件。每當勞動黨中央領導人前往莫斯科時，事先都要會見中共領導人並與之磋商。勞動黨中央領導人還經常專程前往中國，會見中共領導人，而且這些會見從不公布。參見蘇聯駐越使館：〈關於1960年莫斯科會議後越南勞動黨的動向〉，л.35-57。
- ⑦㉔ 越南勞動黨中央書記處：〈關於基本完成農業合作化加強農業生產的指示〉，載《黨文件全集》，第二十一冊，頁446-59。
- ⑦㉕ 中國駐越使館曾多次指出，北越領導人往往只看到中國大躍進的豐碩果實，例如對三天辦起一個工廠、短期內修成一個水庫等很感興趣，而對取得這些果實的根本原因，如三大改造、五大運動、整風反右、大辯論等，尤其是對「政治掛帥」的思想不甚關心。參見中國駐越使館：〈胡主席回國後對我國大躍進的情況宣傳〉，頁46。